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现代性和大都市

Modernity and Metropolis

写作、电影和城市的文艺社群
Writing, Film and Urban Formations

[英] 彼得·布鲁克 著

杨春丽 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现代性和大都市

Modernity and Metropolis

写作、电影和城市的文艺社群

Writing, Film and Urban Formations

[英] 彼得·布鲁克 著

杨春丽 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Ltd.



S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和大都市 / (英)布鲁克(Brooker, P.)著;
杨春丽译.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4. 11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ISBN 978-7-5499-4560-3

I. ①现… II. ①布… ②杨… III. ①城市社会学—
研究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5637 号

© Peter Brooker, 2002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Modernity and Metropolis* by Peter Brooker.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书 名 现代性和大都市:写作、电影和城市的文艺社群
著 者 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er)
译 者 杨春丽
责任编辑 潘守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电话:025-68037410)
厂 址 江苏省南京市新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9.125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4560-3
定 价 45.00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cbs.tmall.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致 谢

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六章分别在《文学现代主义的位置》(*Locations of Literary Modernism*) (Davis & Jenkins 编, Cambridge UP, 2000) 和《城市空间与表征》(*Urban Space and Representation*) (Balshaw & Kennedy 编, Pluto, 2000) 这两部书里出现过, 但是经过修订和扩充。感谢诺丁汉大学和伯明翰大学邀请我开设关于伊安·辛克莱 (Iain Sinclair) 和保罗·奥斯特 (Paul Auster) 的讲座, 感谢诺丁汉大学的道格拉斯·塔拉克 (Douglas Tallack) 教授和苏塞克斯大学的彼得·尼克尔斯 (Peter Nicholls) 教授, 感谢你们支持我向艺术人文研究委员会 (AHRB) 申请于 1999 - 2000 年间做专职研究。也感谢伦敦大学议事大楼高等研究中心在这个项目的早期给予我科研基金, 那时, 我正在研究分别属于埃兹拉·庞德 (Ezra Pound)、伊安·辛克莱和帕特里克·凯勒 (Patrick Keiller) 的不同的伦敦城。

这本书向利兹 (Liz)、威尔 (Will) 和乔 (Joe) 的著作致敬。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一如既往地记着你们。这本书献给这三位博士生, 他们自己的著作和我的书齐头并进。感谢罗杰·梅塔 (Roger Mehta)、米歇尔·登比 (Michelle Denby) 和马克·布朗 (Mark Brown) 的陪伴、交流和指点。

| 目录

001	致谢
001	引言：结束中的开始
034	第一章 现代伦敦的美国现代主义者
068	第二章 延迟的现代主义：哈莱姆的蒙太奇
094	第三章 在民族性之内：市郊人的内心世界
119	第四章 重新想象伦敦
151	第五章 “献给布鲁克林伟大人民共和国的 赞美诗”
177	第六章 “见证我的时代”：萨拉·舒尔曼和 下东城
203	第七章 在矩阵里：东方和西方相遇
233	尾声：后大都市与创造的艺术
249	参考书目
262	索引

引言：结束中的开始

现代性和大都市

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把城市描述为“许多故事的交叉点”，一系列独特的、共存的故事的汇聚点（1999：171）。某些类型的城市故事，那些构成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电影文本的故事，它们如何阐释城市不断变化的物质形态、主体经验和社会经验，这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也就是说，我阅读这些文本，一方面去理解它们是如何解读城市的，另一方面去认识城市的形态和形成过程如何使那些解读成为可能或受到限制。这说明，我认为“想象的”和“实际的”在一个基本的对话里共存，因此，我摒弃后结构主义最近对完全话语的城市或完全书面的城市所做的论述（Wolfreys, 1998, Donald, 1999）。伊安·辛克莱（Iain Sinclair）说“城市是一个更加黑暗的自我：犹如剧场，充满可能性，我可以让从未出现的生命在剧场试演”（1999c：7）。这表达了我如何理解小说和象征性想象的探索作用，因为这种探索揭开了当前现实中可供选择的東西。我最感兴趣的是，个体的或集体的城市身份如何以这样的方式造就、削弱或重新想象。我主要使用伦敦和纽约这两个例子：人们一般认可这两座城市是 19 世纪

和 20 世纪之交、20 世纪前 50 年领先于世界的“现代”城市，人们将它们描述为 20 世纪末典型的“全球化”、“后现代”或“后殖民”城市。在一些评论家看来，千禧年到来的时刻也是“后大都市”的时刻，因为即使在历史悠久的西方城市里，城市生活都完全超越了它早期的经典形式。在本书结束时我会简洁阐述这个主题。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变化和这些术语？如本书标题所示，现代性和大都市至少是开始的地方。我们可以认为，20 世纪城市生活的发展得益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现代性”可用来对这些发展做一个通用的描述。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此直白的一个定义已然搁置了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差异：现代性和西方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或“现代理念”的关系；社会现代性、文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异。不过，给“现代性”一个限定的含义，也一样产生问题。例如，沃德（Ward）和聪茨（Zunz）的《现代性全景》（*The Landscape of Modernity*, 1992）说明从世纪之交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纽约都是当今全球城市的先驱。他们描述了早期纽约作为一座和谐“理性”和“多元化”城市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他们说，战后均质化的影响渐渐退去，与移民新模式和民族性意识有关的多元化趋势更加显著，到了 20 世纪晚期，就出现了一种不平衡。他们说，“民族性又重现活力”（13）。他们的回答是，面对上述的不平衡，要促使“现代性的”互为对抗的“种类和想象”达成新的和解（12），也就是说，将“现代理念”的资本主义形式和文化形式协调起来，使一种形式朝商业利益、城市的均质性方向靠拢，使另一形式朝社会的多样性方向靠拢。

这里有一个问题。用沃德和聪茨的话说，整个 20 世纪冲突一直不断，重心不断的转移，他们也在寻求平衡与和谐。因此，虽然他们将 20 世纪前 10 年、前 20 年的纽约视为全球城市的一个先锋，展示了一个镜子般连续的故事，但是这个城市在这 20 年里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从其最基本的力量布局来说，也是如此。事实上，他们描述的早期的纽约与其说是一个先锋，不如说是商业、规划者和市民三方利益都包容在内的典型城市。现在援引这个例子，意味着抑制这个城市那不

连续的历史的复杂性，勉强将现在用力挤进战前社会民主的定居地。沃德和聪茨选择“现代性”这个术语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其他的人（社会的规划者、建筑师和文化批评家）会认为，在他们讲的故事里，现代性的基调（理性主义）被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基调（多元论）所取代。这里，这个历史叙事既非讲述“以前”和“以后”的一个线性故事，也不属于预言、重复或千篇一律的性质。比如，在 20 世纪 20 年代，黑人从南方各州移居到像纽约这样的北方大城市里，近几十年来西班牙裔和亚裔群体移民到这些大城市里，如果我们想到这种国内迁移和国与国之间的移民之间蕴涵的差异，那么，仅仅认为这是既成事实的早期特征在后来的“强化”，还是不够的。20 世纪早期的纽约不是世纪末的那个全球城市，它“不能再用来定义全世界的全球城市”（3）。

因此，面临纽约这类城市所展示的新趋势，要解释类似特征的持续性，要解释这些特征的加强、转化、逆转、衰退，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对历史进程的阐释和认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认为“后现代性”代替了“现代性”吗？“后”这个名称以及“后现代性”这个术语在不同学科中有不同的含义，这两方面引起的问题广为人知。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让·布什亚（Jean Baudrillard）、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F Lyotard）有关的主要的理论设想使我们在经济和文化上与“现代”彻底决裂，或者赋予我们先锋主义的一臂之力，使我们跨越了今天的标准。人们认为，这先锋主义的一臂之力构成了“后现代”。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认为，我们应当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为对资本主义动态的一种表达，从而化解这些差异，然后利用“现代性”来描述这整个的运动过程。这意味着要接受两个术语。但是，显然，哈维自己一直是保持“现代主义”的视角，这体现在他将社会阶级置于其他的社会指标之上，还体现在他不假思索地抛弃后现代性，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混乱的报应”，是它“虚无的阴暗面”或者“自由的……折中主义”（1996：419，425，433）。后现代主义常常被当作现代性的“他者”——肤浅的、“只是”闹着玩的，

衍生的、不和谐的——总之，是“一团混乱”，它威胁到现代性的和谐和共同目的，它必须回归至现代性。

也许，我们想抵抗对后现代主义这一普通名称的存在和完整性的怀旧情绪，但是它仍然希望证明文化扎根于资本主义。然而，作为一个基本的论点，它不会使我们有很大的进展，或者它会使我们走得太远，因为它基本上适用于两个多世纪的工业社会。如果再仔细地审视，我们就可能看见明显的变化，甚至是进步，以及同一性，或者衰退。例如，劳伦斯·雷尼（Lawrence Rainey，1997）已经表明，现代主义如何与商品生产有很大程度的牵连，它如何既受商业轻重缓急又受艺术轻重缓急的塑造。在这之前，似乎没有他人提出现代主义的这一特征。雷尼加入自己的观点，对现代主义的研究来说极其有用，但是，描述现代主义文化时，倘若认为它属于 20 世纪 90 年代而非 20 世纪前 10 年的金融世界，这样的描述也没有什么成效。生产、所有权、分配（包括电影和电视的作用）急剧变化的条件和科技影响市场对作者和书籍的需求，这明确地告诉我们，文化和商业已经融入更加复杂的叙事。这叙事远比第一章里呈现的情况都要复杂。

因此，给现代性一个宽泛的概念仅仅是摒弃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手段。它使文化注定成为潜在的经济骚乱可悲的后遗症；它促成这样的假设：没有新的事物；现代主义或者 20 世纪 20 年代的纽约捷足先登；也就是说，过去包含了未来；过去的那种完整性，我们绝对能够重新得到，而且会更加圆满，更加和谐。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去拥护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就意味着忽略过去和现在的矛盾和动态。“理性”已经褪去，而且可能回归，而在沃德和聪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资本主义理性继续起着作用，只不过是规模完全不同，领域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比较并非在现代纽约的镜像及其所认为的作为先锋的镜像之间，而是在彼时的全球城市和当今的全球城市之间的比较。

然而，一个城市何时变成了全球城市？它和“大都市”一样吗？

“现代”城市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况？“现代”城市，从它的一个主要用途即强调城市发展的经济、科技和社会特征来说，它是“工业城市”，19 世纪的曼彻斯特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现代”来源于理性、科学、人类进步的启蒙运动的传统，从这一相关的意义上来说，19 世纪末的巴黎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King, 1995: 110 - 111）。欧洲其他的城市（而且这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比如维也纳或柏林，规模虽然小一些，各自的特征却比较明显，但都属于第二种“现代”类型。然而伦敦在 19 世纪末就远远地跑在了这两类城市的前面。在 19 世纪早些时候一直使用“大都市”这个术语形容伦敦，用来帮助理解这个城市面积的增长、它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功能，到了 19 世纪 40 年代它就成为“大英帝国”的商业大本营和世界“金融都市”，远远地跑在曼彻斯特的前面（Garside, 1984: 229）。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伦敦就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城市，人口 550 万（Sutcliffe, 1984: 5），完全符合安德鲁·利斯（Andrew Lees）解释“世界都市（Weltstadt）”这个相关术语时所提供的描述：“一座具有国际重要性的现代大城市”（1984: 67 - 68）。当时，伦敦是一个明显的帝国城市，正如马斯特曼（C. F. G. Masterman）1901 年那直白的标题，伦敦处于“帝国的核心”，它的每一个优势，尤其是它的港口，都使这个城市保持着商业、行政和政治的世界霸权地位。施内尔（Schneer, 1999）根据这些因素将 1900 年的伦敦描述为“帝国大都市”。这有助于突出伦敦这个类型的全球城市——其卓越的依据自己居高临下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依赖军事、意识形态和行政权力的机制。因此，这种情况下的全球化或者这一种全球化意味着征服和剥削，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转变、同化和服从过程。“大都市”（希腊语为“母亲城市”）这个术语，还意味着伦敦在大英帝国的权力和掌控中起着调节的作用。也许，城市的类型、风格以及它主要的雇佣形式支撑着这种作用。因此，在 20 世纪初，伦敦雇佣了两万殖民行政官员，而殖民投资使得富人在伦敦西区定居下来，并享受它日益发展的通讯系统、剧院和新的百货商店（塞尔福里奇 [Selfridges] 百货公司和希尔斯 [Heals] 商店分别于 1909 年和 1917 年开

始营业)。伦敦跨世纪的外貌——在怀特霍尔街以及别处的“爱德华时代的”或者“古典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物；金斯威的建成，从斯特兰德大街延伸到霍尔本区成为一条帝国大道——在彰显大英帝国的优点和辉煌方面也起着一定的作用（Schneer, 1999: 18-28）。

伦敦是世界城市或帝国全球城市的模型，其他欧洲的城市都是基于这个模型的变体。但是，纽约却是一个新的类型。纽约不是一个政治都市而是一个商业都市，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文化城市。在纽约，矗立着举世闻名的、有象征意义的摩天大楼，它首批建成的立交桥有着规模宏大的钢架结构，它的交通系统升入空中，这一切传递的信息是：此时此刻的“现代”就意味着“崭新”。到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就是“现代大都市的典型”（Keating, 1984: 140），这个模型以伦敦、柏林或巴黎不曾使用的方式叙述现在的社会和一个想象的未来的社会。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作用是纽约全球身份的一部分：塑造未来的事物，呼唤其他历史更悠久的国家和它们的公民走向一个新的未来。

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这个未来毕竟会成为过去。因为“我们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和东京看见的高层写字楼的建筑群……已经是先进的城市形态的一种表征，是后工业城市的形象”（1996: 23）。但是，萨森还说，在世界范围内，城市经济区体现的城市形态的这种同质性，与市郊的其他发展趋势并存，市郊由“远离市中心的”、传统的工人阶层以及新的移民社区构成（23）。因此，金融都市和传统的劳动力、白人中产阶级和贫穷的移民，别别扭扭地共同生存着。萨森持续地阐述着这些群体、这些邻里社区之间的差异和联系。

这种状况与早期的纽约有什么不同？从它总体的结构形态来说，它没有产生差别。和其他的全球城市一样，纽约在这个时期继续表现出同质化与去中心化、跨国与局域、理性与多元化之间的冲突。只是在范围、规模、种类上存在着差异。因为在20世纪后期阶段，全球化已经产生了不同的“世界秩序”，在这之中，控制权力技术的是“电子

的人群”(Friedman, 1999)而不是腐败的政治团体(Tammany Hall);而且,服务于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重要的理念从董事会的会议室转移到全球的、无个性、甚至没有具体地方的信息和金融网络或信息和金融“流”里(Castells, 1996)。20世纪最后20年,我们看见第一代全球城市的工业基地逐渐削弱;服务区显而易见的扩展;清一色商场的增多;工人签署短期合同,服务于各个领域;信息技术与媒体技术极其快速地发展,并以不可抵挡之势渗透进各领域。

这些是“后福特主义”的特征。“后福特主义”,如此命名,是因为生产技术、生产经验所代表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实业界巨头亨利·T. 福特(Henry T. Ford)对自己的劳动力和他们家庭的支配性影响已经过去。福特主义呈现的是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20世纪早期到中期的现代性:生产型经济进入消费社会前的象征。福特主义的工厂管理方式在阶级、男性、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以及女性和家之间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关系。在后福特主义状态中,这些关系证明是有孔的,可以渗透的,我们的社会、种族、性别、心理生活已经受到传媒技术的进一步塑造。有了电脑显示器或电视屏幕,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世界就在家里,或者根本没有具体的位置。这种效果,在许多作家和评论家看来,都是戏剧化的,尤其是在城市里,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的感觉或自我创造的感觉,无归属的感觉,一种恐惧、多疑、怀旧的城市心态(Kennedy, 2000)。

萨森对两种共存的极端做了分析,我也想在她分析的基础上增添一些我的观察。首先,现在的富人、工人阶层、社会上的少数群体从数量、年龄、性别、族群、职业、教育、科技和主流文化来说都与以往不同。第二,在现代都市的城市空间里,空间上的接近和社会经济上的差距有了史无前例的结合:比如,在伦敦的斯皮塔佛德,先进的企业资本主义与酒吧、时装商店、改建的高价仓库、孟加拉的社区每天面对面的接触;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纽约东村中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和无家可归者不甚安宁地共存着(见Abu-Lughod, 1994和本书第四、六章)。第三,这些特征有一种共同认可的普遍性。也就

是说，两个极端之间复杂的联系和断裂是东西方的全球城市共同拥有的。产生的结果是，生产（从手工到高科技）或者住房（扁平的城市上方矗立着豪华的高楼）这种两极分化的模式与相应的阶层、族群共同存在，将“第三世界”带进“第一世界”里。安东尼·D. 金（Anthony D. King, 1995: 120 - 121）指出，人们很晚才在西方看出这种效果。如金和其他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倘若人们觉得纽约的一些部分类似新加坡而另一些部分类似贝鲁特或开罗，那么，我想，这就是当今的纽约城和早期纽约的距离和差异之处。

事实上，这用来描绘大都市在“多元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形态。沃德和聪茨将“多元化”这个术语与一种富有活力的民族和文化多样性以及“多样化的人群”联系起来，这“多样化的人群”与那些只看见“表面混乱”和“郊区失控蔓延”（5, 9）的建筑商、规划者和地产投机商进行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塑造了居民区”（12）。纽约各个居民区的历史结构，商业和人群最近从纽约城迁移出去，这其中还有更多的故事。因为，正如沃德和聪茨所论证的，在最近几年，美国黑人、西班牙裔美国人、亚洲人和其他更新、更小的群体由少数人逐渐变成纽约城的大多数人口，这一点再次使得这个时期的纽约城与几十年前的纽约大相径庭，这体现在人口数量、民族群体和他们相应的邻里社区上（Brooke, 1996, 127 - 130）。伴随着这种变化，而且成为这种变化部分原因的是最近出现的城市去工业化和向外迁移的影响。正如彼得·霍尔（Peter Hall, 1984）所说，这两种趋势也是西方主要城市共有的特征。说到美国时，他这样写道：

看来，各种经济活动都不再需要直接的、密集的、面对面的接触，而这种接触在 20 世纪 50 年代构成了都市群（metropolitan agglomeration）的基础……因此，科技和经济的力量将企业家带到远处更新、更大型的活动中，而社会力量——居民的好恶、对犯罪的恐惧、对优质环境的追求——也把人们带走了（444）。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迁走了。这个年代的去中心化，朝着郊区和小镇的“白人迁移”，都使我们明白，时间久的族群、新来的族群，以及现在的失业工人所构成的下层贫困社会都集中在内城。威廉·J. 威尔逊（William J. Wilson, 1987）发现，下层贫困社会在城市贫民区的产生，是因为制造业向信息产品的转型。根据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的描述，他们是一个“新的阶层”，完全无法使用信息和通讯设备，“从工人阶层向下沦落”（1994：130）。那么，我们就能明白，在后现代的一种最含糊不清的歧义里，“多元化”以及这个术语所暗示的多样性、去中心化或者去疆域化为什么既可以解读为积极的和解放的，又可以解读为史无前例的不平等、赤贫和漠视的证据。

在彼得·霍尔看来，这些趋势象征了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生机勃勃的黄金时代”过后“大都市走向衰落的新现实”（1984：431）。他相信，伦敦和纽约有着同样的经历。他论证说，在伦敦，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率“无计划的”的上下浮动，人们先从伦敦北部迁移到南部然后又迁出城外，这一切都证明了“计划能够产生和谐、稳定的状态这一假设”是错误的（34）。在这个时期人们刚刚认可的“内城”里，制造业规模的缩小产生了失业现象，这成为诺丁山、布里克斯顿、托特纳姆发生的“种族骚乱”的导火线，此时，第二代非洲裔加勒比人抗议社会的弊端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虽然这些情况继续存在，非洲裔加勒比人和越来越大的南亚人的社区（加在一起有100多万的人口）在伦敦南部、西部和东区的截然不同的区域里建立起来。伦敦和纽约以及其他的地方一样，如沃德和聪茨所说，“民族性又重现活力”。要理解变更的身份，理解自我和他者，民族性是一个重点，也是贯穿这本书的一个有趣的要点。但是，应该澄清的是：民族性的范围和意识（再加上与之相关的文化差异、社会不平等和国家的政策等问题）意味着在全球化的这个阶段，从细节上看，这些城市互相之间是不同的，而且从社会和经济的意义上看，它们与几

十年前的全球城市又有着本质的差异。^①

英国和美国的政治领袖都竭力维持商业和国家之间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Zizek) 指出, 对于布莱尔 (Blair) 领导的英国工党和克林顿 (Clinton) 领导的民主党来说, 这种所谓的“第三路线”“把我们带回到第一、唯一的路线: 戴着人的面具的全球资本主义” (1999: 7)。尼克·科恩 (Nick Cohen) 认为, 查尔斯·利德贝特 (Charles Leadbetter) 的著作《凭空活着: 新经济》 (*Living on Thin Air: The New Economy*, 1999) 为布莱尔政党的现代性概念进行书面辩护, 布莱尔政党的现代性概念是“由计算机驱动的全球知识经济”, 其口号是“全球化是好的” (1999: 33, 34)。布莱尔当然坚持认为他的路线就是“现代的”或“现代化的”路线。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以社会多样性为名义, 以依赖社会平等的另一种统一性为名义而立足的。坚持相信一种可资替代的政治现代性, 这意味着去挑战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单一视角。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就是一个不厌其烦地提出这种挑战的人。威廉斯不仅仅相信社会主义 (对于布莱尔和克林顿来说, 这是一个拗口的概念; 可想, 对乔治·

①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 (Janet Abu-Lughod) 在她的权威著作《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 美国的全球城市》 (*New York, Chicago and Los Angeles: America's Global Cities*, 1999) 里面列举了全球城市的特点: 市场的国际化; 交通和通讯系统的大变革; 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 生产的去中心化和经济控制的中心化相结合; 商业服务的增长; 伴随这些变化的, 还有“阶级结构所谓的重新分化……贫富差距加大” (2)。她和沃德、聪茨有些相像, 希望证明“至少处于胚胎阶段的所有这些特点”, 是在 19 世纪中期或晚期的纽约出现的 (2)。我并不赞成阿布-卢格霍德使用“胚胎”或“胚芽”这种进化论的比喻; 不过, 她自己确实坚持认为“已经建成的环境不是有机体”, “它已经被创造而且继续被重新创造” (4)。这更加接近我这里采用的现代性的“自反性”观点。阿布-卢格霍德在研究三个美国全球城市的过程中, 试图将注意力引向“重要的变体”这个方面, 认为这些变体的产生是因为不断地扎根于“一个进化的世界体系中” (1)。我不能明白, 她如何或为何认为这种方法适用于城市的共时比较而不适用于城市的历史。

W. 布什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概念），还相信“多种社会主义”——因为“既然有许多民族和文化，就有许多种社会主义”，威廉斯如此说（1989b：297）。雷蒙德·威廉斯还说，一种未来的共同的文化，就是“我们可能朝着它前进的一种社会”，与早期的社会形态相比，不会更简单，不会“更单一，更直线发展”，只会更复杂（1989b：37，295）。要探讨这种复杂性，仅靠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消解为不变的、无所不容的资本主义动态，这是行不通的；我们也不可能重新提起早期的、信以为真的和谐。相反，我们需要依据威廉斯强调的某一历史关头主要的、残余的和新兴的这三种趋势之间的区别，以重申各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关系，使一种经济秩序内的连续和断裂成为可能。这种经济秩序通过对灵活性、发展性和多样化持之以恒的坚持，才能够看似矛盾地保守自己，保持“不变”。

同时，我们需要使这一模型适应文化内或跨文化的不同时刻。戴维·哈维发现的“空间-时间压缩”的经验，以及与之相随的对个人和社会身份理解的变化，这一切总体上被视为是全球化的主要影响。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我会再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我会增加一些内容。约翰·伯格（John Berger）论证说，“现代历史”是“在不同地方不同的时刻”开始的（1992：203）。霍米·巴巴（Homi Bhabha）同样也发现了现代性“模棱两可的短暂性”。因为正如文化现在都遵循自己从过去到现代的这种过渡感，所以“现代性标志的每一次重复都不相同，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阐释的状况来说都是独特的”（Bhabha 1994：247）。还有一种东西被称为“变得现代”。根据利奥塔和霍米·巴巴的观点，我们可能把“后”理解为新事物崭露头角的标志：一种运动在当前的主导性秩序里产生，“超越”了现存的状况，到达了明确无误的突破点。也就是说，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曾经是次要的；现在理所当然的事物曾经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一过程视为具体历史和文化中不同时代被激活的，而不要把它看作朝着新事物前进的“永恒”动力，这也是利奥塔的观点。因此，克莱德·泰勒（Clyde Taylor）评论非洲的电影时说，当第一个现代主义的阶段“尚未真正开始”时，

“黑人只能含糊地成为后现代主义者”（1988：108）。同样，杰里米·西布鲁克（Jeremy Seabrook）也在东方快速发展的“后工业”的社会里发现一种变化的模式，它重复了英国工业化早期工人的经历（1996：1-3）。这说明，如果微技术和全球化的经济结为联盟，压缩空间和时间，使世界文化均质化，进入一个单一的市场，那么，这些同样的过程已经同时有助于将财富和机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差异置于明显的位置，横跨时空将相似和差异体现出来，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一种文化、社区或城市里结合起来，将规则的顺序推进不规则的顺序里。

自反性（reflexivity）

我认为，我们通常理解的现代和后现代的区别无法成功地描绘作为全球化特征的混合与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也无法成功地描述当今城市所经历的现代生活重叠的多种模式中局域和全球的汇聚和交叉。我想，“现代性”蕴含着这种模式：它尤其出现在城市里，不断更替的关系，多层的转义，普通但是相异的叙事，在衰退、转化和变成现实这一过程中移动。正如哈维所认为的那样，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模型来理解转化和存在这两种“空间形态和时间过程”，因为“城市化的动态[过程]和城市的构成物[存在]在一种基本的创造性的矛盾中存在”，构成“社会-生态转变的一个关键点”（Harvey, 1996：436）。在这里，我赞同哈维的观点，努力构想一个视角，去研究他描述的“‘空间-时间不平衡的发展’”或者“‘地域上不平衡的开发’”（1996：429-430）。我最后想强调“多种现代性”的共存，每一种都是在自己“当前”的时间变成现实的，而且携带着过去形态的痕迹，蕴涵着可能的、可供选择的多种未来。因此，现代性是追溯性的和前瞻性的工程，一个现在的或未来的形态能够评价并使早期的一种表达显得极端，贝克（Beck）和吉登斯（Giddens）在他们的“自反性现代化”的概念里也表达了这个观点。吉登斯说，所有的社会和制度形态极易于“根据新信息和新知识而不断地修正”（1993：293-294）。现代性虽然是启蒙思